·中国典籍在海外·

《黄帝内经》的当代价值

□ 何明星　黄建平

《黄帝内经》相传为黄帝所作，学术界一般认为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成书于西汉中晚期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略》。《黄帝内经》包括“素问”“灵枢”两部分，在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中医学的“阴阳五行说”“脉象学说”“经络学说”“病因学说”“养生学”等理论，奠定了人体生理、病理、诊断及治疗的认识基础，被称为医之始祖。

笔者在2021年12月利用OCLC数据库检索，发现《黄帝内经》除英语译本59种、德语译本10种、日语译本8种、法语译本7种外，还涉及西班牙语、韩语、匈牙利语、越南语、马尔加什语等16种语言。收录当今世界多个SSCI顶级期刊的JSTOR数据库中，有736篇《黄帝内经》研究论文。《黄帝内经》的研究与应用，已成为一门“显学”。

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

据史书记载，唐代名僧鉴真东渡日本时，随身携带了《黄帝内经》。公元7世纪，日本仿照唐朝设置医事制度，其针灸教材即包括《素问》《黄帝针经》。据李经纬教授考证，1370年，日本人竹田长庆拜中国道士为师学医，回日本时携带大批中医典籍和针灸明堂图，其中就有《素问》《灵枢》。1985年，曾著《黄帝内经和中国古代医学》一书的丸山敏秋，与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的龙伯坚合作完成了《黄帝内经概论》。

大约在唐代，到访中国的朝鲜官员、儒士和医户将中国医学典籍如《素问》《神农本草经》《伤寒论》《诸病源候论》《千金要方》等带回朝鲜半岛。18世纪末期，开始用朝鲜语（韩语）翻译中医典籍。2004年，韩国东元文化社出版了全勇民翻译的《黄帝内经》韩语译本。

据越南史书记载，公元前257年，中国医生崔伟在越南行医。隋唐时期，《黄帝内经》《脉经》等在东南亚一带传播。宋元明时期，越南本土医家撰写研究中医典籍的心得著述。明代后期，大批华人躲避战乱移居东南亚，不少中医药师在越南、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等地行医或开设中药店，《黄帝内经》出现了越南文、泰文、印尼文等本地语译本。

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晚年撰写的笔记中，简略提到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脉学、中药。1851年，都灵大学外科临床主任里伯利使用针灸止痛，威尼斯医生卡米诺用针灸治疗颜面神经痛，并著有《针术操作法》。

《黄帝内经》在西班牙有3位译者的7个版本，其中特蕾莎·桑斯·莫拉雷斯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影响力最大。

20世纪中叶前，中医被美国人视为“巫医”。1972年尼克松访华，随行医生塔卡参观针灸麻醉手术后说：“我看到的东西很少，但足以使我相信其中有重要的东西存在，这是我们应当重视的，并在临床上应用它。”

自此，美国一些著名医学刊物和报刊开始刊登介绍中医、针灸的文章，中国针灸被誉为“东方神针”。1986年，全美51个州中的29个陆续确立了中医针灸合法地位。

美籍华裔倪毛信拥有双语背景，他灵活阐述《黄帝内经》中晦涩的中医学知识，并灵活加入可视化的题词、插图等，其英译本在亚马逊网上销售量最高，获得的读者阅读评论数量位居第一。

慕尼黑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与同事合译的《黄帝内经》英译本较为权威，他还编写《〈黄帝内经·素问〉词典》，对术语和概念进行严谨的对比研究，并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了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的自然观、人体观、疾病观、健康观、养生观和各种治疗规则以及“五运六气”，这是西方学者研究、阐释中国宇宙观、生命运行等古老文化知识体系在当今世界价值的开端。

在西方世界的传播

据李经纬考证，波兰传教士卜弥格1643年用拉丁文撰写的《中国植物志》一书，谈到中国医学已发现并运用阴阳五行理论及脉搏跳动的规律，内容当出自《黄帝内经》之《灵枢·五十营》。

1825年，欧洲汉学家、法兰西学院教授埃布尔·雷穆萨特发表《谈谈针灸》一文。亲眼目睹中国医生用针灸救治霍乱患者后，在中国任外交官的苏理莫昂，回国后辞职，专门从事针灸临床与教学，1934年出版了《真正的中国针刺术》，写了12本介绍中医学的小册子，直接促成了西方社会“顺势疗法”的出现，针灸、推拿等中医疗法开始进入临床应用。

出生在法国的华裔陈耀华在巴黎内克尔大学医院学习时，对中医产生了兴趣，参加了法国针灸协会、上海国际针灸学校的学习，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针灸和中医治疗，他的《黄帝内经》法译本最受欢迎。

重新认知生命、宇宙

留法学者贺霆教授在对欧洲国家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发现，20世纪上半叶，一批具有西方现代医学背景的全科医生，重新发现了传统中医的巨大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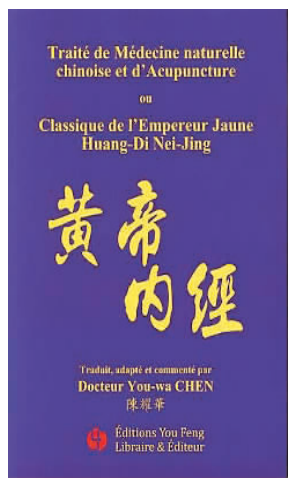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“西学中医”即欧洲本土化中医，在《黄帝内经》等典籍基础上不断创新，发展出法国的苏里耶学派、腊味爱学派、仁表古典针灸学派和时空针灸学派，英国的五行针灸学派和天干地支针灸学派，西班牙的“天”子中医学派等。西班牙有个学校以“黄帝内经”命名，目前在欧洲及南美40多个国家已开设100多所分校。

腊味爱为法国牙医，幼年时对古汉语感兴趣，上世纪50年代赴中国台湾学习针灸，穷毕生精力将《黄帝内经》及针灸穴位名称转为甲骨文，以文字象形加以解读并用于临床，两个分支弟子完善了他的“六气学说”，其英国弟子华礼士自创“五行针灸”传世。腊味爱弟子至今仍操练一套由师祖教授的奇特“太极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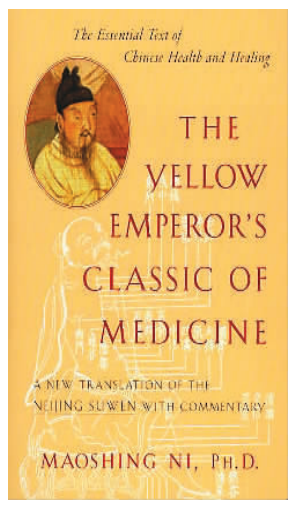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西学中医，充分发挥中华宇宙观、生命观的文化精神，丰富了西方民众对“不可能事物”的文化想象，让他们重新认知生命与宇宙万物的关系，以医治西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焦虑。

1985年，“两弹元勋”钱学森说：“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，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。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，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——科学革命。”西方气象学、天文学、量子力学、生物学、医学科学的发展轨迹证明了这一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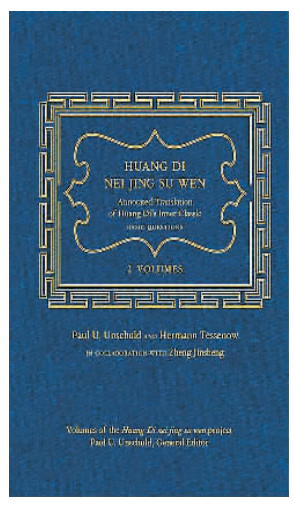
龙伯坚著、丸山敏秋翻译的日文版《黄帝内经概论》，东洋出版社，1985年版。



陈耀华的《黄帝内经》法语译本，巴黎友丰出版社，2013年版。



倪毛信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全译本，香巴拉出版社，1995年版。



文树德和特森诺合作翻译的《黄帝内经》英译本（第一卷），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版。

散落而不灭的红色星火

□ 杜　渝

2022年4月23日“世界读书日”当晚，央视播出的《全民阅读大会：2021年度中国好书》盛典上，揭晓42种2021年度中国好书，《重生——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》（漓江出版社）即其中之一。

翻开这本书，你会看到一张跨页图片，上面是一张张饱经风霜老人的脸，中间有一句简短的话：“2014年，刘华连老人96岁高寿逝世，至此，湘江战役桂北失散红军全部归队……”“归队”，这是当年参加湘江战役突围的所有红军战士心中最强烈的愿望。

2021年4月2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指出，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，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。红军将士视死如归、向死而生、一往无前，靠的是理想信念。

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，给桂北大地烙下悲壮的红色印记。湘江战役之后，一些因伤掉队的红军战士被迫滞留在兴安、全州、灌阳、龙胜等地，他们四处躲避国民党和桂军、民团的追捕，与逆境抗争，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幸存。

1978年2月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行署文化局红军长征过桂北调查组沿长征路线，调查了7个县34个公社136个大队，访问了550多位当年帮助过红军的群众以及77位在当地安家落户的掉队红军，撰写了《关于调查掉队红军的情况报告》。1979年暑假，广西大学中文系大一学生李时新，与未来岳父拜访了湘江战役中因伤掉队红军、全州县咸水林场副场长陈新州；1985年清明节，李时新走进都庞岭大山余脉山腰谷地镰刀湾村，与失散红军兰金甫促膝长谈，开始了对失散红军长达40年的追踪采访。李时新以丰厚的口述实录为基础，辅以珍贵的历史文献，鲜活再现了22位失散红军战士经历湘江血战的生命沸点，又回归乡村的特殊命运。他们如散落的红色星火，经历了迷惘、困惑、痛苦的心路，无论是怎样的归宿，都带着感恩之心及忠诚信仰，开始了新的人生。

该书弥补了湘江战役研究关于失散红军这一缺失，极具史料价值。编辑团队与掌阅科技联手，最终将此书做成了一本融纸质书、电子书、有声书为一体的复合出版物，多载体、多形式、多媒介的内容分发，使该书在出版数月内获得了超过百万的阅读流量，长征精神被更多的人记忆传承。

《苏东坡书法全集》集苏东坡存世书法作品大成

本报电（吴爱玮）近日，由青岛出版社与故宫博物院联手打造的《苏东坡书法全集》（以下简称《全集》）正式出版，这是汇集苏东坡存世书法作品的集大成之作，首次全面收录苏东坡海内外存世之墨迹、法帖、碑刻等作品。

《全集》为套书，共6卷，其中墨迹2卷、法帖3卷、碑刻1卷。书中精选了分散在海内外各大博物馆、收藏单位、图书馆中的苏东坡存世墨迹43幅、法帖15幅、碑刻8幅。《寒食诗帖》《李白仙诗卷》《归去来辞卷》《前赤壁赋卷》《祭黄几道文卷》《答谢民师论文帖卷》《东坡苏公帖》《成都西楼苏帖》等作品均闻名于世且代表了苏东坡书法的艺术高度。据悉，《全集》已入选“十四五”时期国家重点图书、音像、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。

《阅读社会学——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》日文版出版

本报电（记者岳林炜）4月23日，该书作者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黄晓新在线致辞表示，日文版是《阅读社会学》第一个外文版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，在崇尚阅读的国度日本推出，非常有意义。翻译团队代表平松宏子表示，这不仅是一本厚重的学术性著作，也是一本切实生动、通俗易懂的读物。

之后，“日本朋友讲中国故事之友会”阅读俱乐部成立，该组织将每月举行“读好书，知中国”交流活动。

为故宫学成一家言

□ 徐婉玲

故宫，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。2022年2月，《太和充满：郑欣淼说故宫》（以下简称《太和充满》）正式出版。

“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”，思想可以凝练至一句话，然而，要准确阐释却绝非易事。

故宫及其文物之所以是典型而独特的，主要是因为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的丰富度和内在联系的整体性。《太和充满》从紫禁城的营建技艺、规划思想和建筑意象，阐述了故宫及其建筑的集大成性——自《石渠宝笈》《西清古鉴》《四库全书》的著录编纂，述及养心殿“三希帖”和静怡轩“四美具”的聚散存藏，展现了中国宫廷收藏的文化传承意义；由故宫博物院开院，忆及故宫文物南迁历程，梳理两岸故宫藏品的源流，探讨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曲折发展。《太和充满》既有宏大叙事的铺陈，又有微观细节的表达，向读者呈现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接续传承，六百年紫禁城的盛衰荣辱，百年故宫博物院的沧桑变化。

“两岸故宫同根同源”，历史血脉无法割断。作为两岸文化交往的推动者，郑欣淼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两岸故宫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。他回忆易培基，着眼“完整故宫保管计划”的高瞻远瞩，反思探索故宫遗产完整保护的实践之道；纪念马衡，叙述故宫文物南迁的颠沛流离，传承弘扬视文物为生命的典守精神；缅怀吴仲超，回顾古建修缮、陈列展览和文物修复的科学规划，检视展望故宫博物院多元立体的发展格局；与李敖畅谈，摒弃偏见，增进共识，促成乾隆御跋之回归；与秦孝仪唱和，跨海相会，惺惺相惜，共叙两岸故宫之情谊；与饶宗颐交往，鸿雁传书，赠言勉励，探讨故宫学术之要义……殷殷之情，见证穿越时空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。

“故宫在北京，故宫学在中国、在世界”，看似学术理想的感性表达，实则关乎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。故宫、故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具有世界文化价值与意义。20世纪上半叶，秉持“为学术公开张本”的初衷，故宫博物院积极吸纳外国专家学者参与业务发展。俄国人钢和泰潜心梵文研究，受聘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，进入宝相楼拍摄700余幅佛像，奠定佛教图像学经典《两种喇嘛教神系》之基础。英国人大维德醉心中国瓷器，捐款修缮景阳宫陈列室，发起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，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大美。

进入21世纪，故宫博物院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架构起传统与现代、历史与当下、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。倡导故宫学，在传统文化体系内探索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，举办太和论坛，开启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新征程，推动跨文化沟通互鉴。饶宗颐曾以草书联“于文献丛开新格局，为故宫学成一家言”寄赠郑欣淼，实为对他工作的最好总结。

一直以来，郑欣淼以治学者的眼光梳理研读尘封的史料，让历史之光照亮现实；用管理者的行动切实推进文化交流，架构起跨越时空的桥梁；他凭亲历者的体会，讲述故宫物、故宫事、故宫人，使故宫精神代代延续。落实在书中，就构成了《太和充满》最大的特点——于文献考释中见思想，于事实陈述里见精神，于娓娓道来处见情感。

书边杂写

□ 路来森

写得一手好书话的谷林先生有篇文章叫《书边杂写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尽管长居城市莫不有公立图书馆，工作单位也总有资料室，却还是老爱自己买几本书，而且有时候是在借到读过之后再去买来的。揣在‘自家怀里’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在可以于书前书后天头地脚随意涂抹——有时摘抄相干或不相干的资料，有时记录阅读中一闪而过的飘忽联想，至少比另外备办笔记本、日记册来得省事，也管用——倘若雨窗雪夜，有闲无聊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想要翻阅一下记忆的夹袋那当儿。”

阅读至此，大有“知音”之感。真正会读书、喜欢读书的人，是不满足于“勾勾画画”的，那不过是水过地皮湿。要想对阅读的内容形成深刻印象，就必得“有所思”，并且记录下来。因此，“随意涂抹”，就成为一种必要。

我之读书，亦有此习惯。“随意涂抹”之内容，无外乎三个方面：

一是对阅读内容的简要概括，用三两个词或者一两句话，力求言简意赅，归纳到位。如此做的最大好处是，下次浏览，能在最短时间对内容有个总体了解；同时也培养了自己归纳、概括的能力。

二是引类联想，对喜欢的内容或观点展开联想，瓜瓜蔓蔓，牵连出众多相关的内容，以之丰富或佐证读到的内容，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充分调动自己的阅读储存，实际上就是一种阅读的自觉拓展和丰富。

例如，读到写夏夜纳凉的文章，我就顺便记下一些相关词语和风俗，甚至直接把清·项映薇《古禾杂识》记“夏夕纳凉”的一段文字，全文录于书之“天头”。

三是记下自己的阅读“思考”，或是乍然而现的一些想法。所谓“思考”，其实就是自己对内容的看法或观点，不必刻意考虑正确与否，“一得之见”，也好。阅读过程中，也会有“灵感”突现，虽是短促一瞬间，却弥足珍贵，即时记下，大有必要。

阅读，读到“兴味”处或者“兴味”时，常常还会“触景生情”，亦不妨记录。

“此情此景”，恰好印证了你当时的阅读情景或心情，为自己的读书，很是加增了一些情趣。如周作人读《扬州画舫录》“题记”曰：“秋冷多闲，摘录数则，庄诵一过，且喜且愧，自己无论如何用心，总写不出这样好文字，若写时又须由会而至不会，则愈亦难矣。”文字虽短，但这里面有时令，有心情，有感慨，可谓丰富矣。读之，让人觉得情味倍加。

我之藏书，有不少“复本”，一是因了版本的喜欢，二是因为要“随意涂抹”。极喜欢英国作家莎拉·贝克韦尔的作品，目前翻译到中国的只有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和《阅读蒙田是为了生活》。两本书，我均有“复本”，俱是因为前本阅读时“涂抹”过甚，只好再买一本备读。

其实，这种“随意涂抹”，即是古人所谓的“题记”“题跋”文字，因非刻意为之，有较大的随意性，也就更具性情。

此等文字，前人（特别是名人）多会结而成集，出版为书。古代文人的种种“题跋”书汗牛充栋，就不必说了，现、当代文人，亦多有践行此事者。例如孙犁的《书衣文录》和上文提到的谷林的《书边杂写》，俱是此类情况。

我于“随意涂抹”亦是受益多多，其中之一就是常将“涂抹文字”联想、整理，结构成文，进而结出一枚枚小小的写作“果实”，诚乐事也。